

名報人黃天鵬

天廬論叢代序

序

一、名記者黃天鵬

老報人黃天鵬先生今年七十整壽，他的門生故舊把他近年來專書以外的一些著作，輯成「天廬論叢」，藉以紀念他執教四十年。依照張岳公的說法「人生七十才開始」，天鵬先生的年齡不算老，但他在新聞界的確資深，稱得起老報人了。

我知道天鵬先生的大名還是在「九一八」以前，遠在哈爾濱。那時我已由河北故鄉去東北五年，在哈爾濱國際協報幫忙，同時任天津大公報特約記者，對於全國報業概況，頗為關心，除每閱覽平津報紙外，對於京滬報紙也偶有涉獵。平津報紙以新聞編排與學術論文及副刊為重。一般上海報紙則着重廣告刊登與娛樂新聞等，往往爲了遷就廣告戶之要求，不顧新聞版面之完整，甚至於如「九一八」前數年之申報、新聞報，把新聞電報縷列起來，不加綜合，不加修飾，僅有一個簡單標題，令我們北方讀者着實看不慣。至於報紙上學術氣氛，更是稀薄得很。那時候北方

商家之所以訂上海報，完全爲了它張數多，（每

天四大張）可供包裝東西之用，算起來比在當地買紙便宜。真正拿它當新聞讀的，可以說很少。

約在民國十五、六年時，我就發現「時事新報」在上海報業中有獨特風格。首先它不受廣告戶的左右，任意伸縮版面，每天維持固定篇幅刊登新聞，同時有專欄刊登學術性文章。副刊「青光」，和北平晨報「副刊」與大公報的「小公園」有相同的編輯法，每天刊載名作家的散文、雜文、遊記、小說等等，那是副刊原始與典型形式。

這自然引起我莫大興趣，因爲我正爲國際協報編副刊「國際公園」。同時時事新報每週發刊學術性的「學燈」，其中多是當代專家學者的著作，

有的關於世界思潮的，有的是考古的，有關文史的，也有關哲學的，還有許多引人興趣的雜著。

這兩個刊物，對於影響時事新報在報界的地位，實在很大。一直到抗戰期間，時事新報維持

「青光」與「學燈」於不墜，可以說一提起時事

新報來，首先想到這兩個副刊。可知它們之受人愛戴，與影響力之大。

因爲時事新報在上海報中的特殊風格與內容，引起我對該報閱讀的興趣。我在新聞版中發現「黃天鵬」這個名字。我看他到各處旅行，參觀後所寫的有系統的報導，不但文字生動，描寫也極爲深入。彼時尚無「報導文學」之名，甚至於連「特別欄」、「邊欄」與「闢欄」這種稱呼，還在萌芽。各報館祇是把這類文章編排在新聞版的顯著地位，以引起讀者注意而已。那個時候，像這種文章並不多，但這種「特寫」顯然已受到讀者的廣泛注意，而有系統的描寫也正在發展之中。

天鵬先生的「特寫」從彼時起，一直到他去東北採訪「萬寶山慘案」，以及「九一八」後的華北旅行，所寫報導性的文章，影響着全國讀者的興趣，並獲得廣泛的讚譽。

他的大名遠近傳播，名記者的頭銜，已不輕

有的關於世界思潮的，有的是考古的，有關文史的，也有關哲學的，還有許多引人興趣的雜著。

這兩個刊物，對於影響時事新報在報界的地位，實在很大。一直到抗戰期間，時事新報維持

而走。至於後來申報的陳賡雅、新聞報的陸詒等，遠不及他寫的好，而名氣也甚短促。

因此，民國二十年秋，我自哈爾濱撤退到上海後，經過大公報駐滬記者李子寬兄的介紹，首先拜訪了天鵬先生於時事新報館。我那次印象是：他是一位誠樸、厚道、精細而活躍的新聞從業員。本來，人有各種型態，新聞記者是由人充當的當然因人而異。那時他才二十五歲，正當青年時期，他的成熟外表，象徵了他潛深的內涵。後來我也認識了許多相倣年齡的記者，若干則呈現出一股飛揚浮躁、目中無人的氣概，所謂「海派」是也。跟天鵬先生齊名的還有新聞報的顧執中，文章寫的也挺好，但我對他的爲人則印象不深。

那時正是三十年代。上海文人藉租界唱反調，左傾文壇大行其道。但時事新報的「青光」與「學燈」則甚少刊登左派言論。這是我喜愛該報，以及崇敬天鵬先生的最重要原因。

一、新聞事業與新聞教育的成功者

我在上海待了四個年頭，除偶讀申、新、時報外，當地報却只訂閱時事新報。後來又加訂「太晚報」（曾虛白先生主持）。其餘時間仍每日閱讀天津「大公報」「益世報」及北平「晨報」等。

中國大學裏開創新聞學系始自何年何學，因手頭無資料，我不能確言。但北方有燕京、南方有復旦，則係盡人皆知之事。民國十四、五年間，社會上對於讀新聞學系，存有不正確觀念，以爲新聞有什麼可讀的？會寫文章就能當新聞記者，

和編報。因此最初投考新聞系的其中不乏懶學生及成績較差的青年。大家都存有「只要考進去，混幾年也就畢業了」的觀念。慢慢才發現新聞系所涉及範圍至廣，也如大海浩瀚無邊，既要有基本學識，也要有專門技能。新聞學在我國尚停留，在「文人論政」時代，在西洋早已進入「企業管理」了。尤其是所需要的語文技能與專門知識，更爲一個夠格的新聞記者必備條件。

這個時期，天鵬先生從復旦大學新聞系的開創，以及後來滬江大學也增設新聞科，他在兩校都擔任了主角。以他從日本各大學及新聞研究機構所學習新聞知識及正式從事報館工作多年後的政治觀點、主張，固少有可取，但僅以編排版面而論，在世界報壇中實有其獨特地位，尤其是

黃氏於論新聞一文中，曾說：「新聞學源出於史。今日之新聞，即明日之歷史。我們要以中華傳統之史學精神擗探西洋傳播技術，創造新聞的新時代。」

誠然，今天的新聞記者，就是歷史的採訪者

、立言人。今天的報館編輯，就是歷史的纂修。

總主筆及總編輯等於歷史的監修。其餘任何一位新聞從業員都爲歷史分擔着責任，都是歷史的創作者。

前十五年我在某大學教授新聞課程，鑒於新聞系學生不讀報，上課前不知世界已發生的大事，及國內重要新聞，曾慨嘆地說：「應該開一課，叫『讀報』！」就是讓學生在教室讀半小時的日報，然後以半小時討論、問答。若是兩小時的課

，可一半一半。我想，這種課比較實用，也比較純理論的受人歡迎。可惜到今天，新聞系還沒聽說有這一課的增添，而讀新聞學的人照舊不讀報，寧非可悲！

日本自明治維新後，一切倣效西洋，報紙編

排也不例外。更由於漢字排列順序的不同，利用綜合編輯法，並插入圖片與利用各種花線，使版面美觀，全盤藝術化，令讀者先不用讀內容，只

看外表，就愛不忍釋。所以多少年來，日本報紙的政治觀點、主張，固少有可取，但僅以編排版面而論，在世界報壇中實有其獨特地位，尤其是

國報美觀、生動；至於印刷之精美，尤不待言。

天鵬先生在復旦及滬江兩個大學的新聞，以及來台後，在政大、文化學院、政戰學校等處，除學理外，在編輯技術方面，也傳授其經驗與心得。時事新報當年版面較上海各報美觀與生動，完全由於黃氏指導之功。

他執教復旦大學四十年，桃李滿天下，在大陸未淪陷期間，他的學生遍及南北新聞機構，對於新聞事業之貢獻，功不可沒，如今又有新生的多代，而老兵不老，確是可喜。

二、重慶各報聯合版的舵手

凡抗戰期間在重慶待過的人，都知道有「重慶各報聯合版」的發行。這是報業史上的一樁大事。既是一件慘痛的經驗，也是一件光榮的紀錄

，反映着一個時代，反映着在急難中團結一致的精祌。

這件事應是天鵬先生半生中值得紀念，也值得大書特書得意事蹟之一。

民國二十八年渝市經過日機於五月三日、四日濫行轟炸之後，火燒山城，數日不熄，斷垣殘壁，到處一片瓦礫，水電中斷，全市陷入黑暗困境。在新聞事業方面，除一二家能維持出版外，大多數因報館被炸，機件設備全毀，不能繼續印刷。這就是歷史上所謂「五三」「五四」大轟炸所波及新聞界的情形。

五月五日，各報館負責人集議研究辦法，恰好最高當局也下手諭，命令各報一律疏散郊外，在停刊期間，發行「聯合版」。於是決議成立「重慶各報聯合版委員會」，由各報負責人擔任委員，並互推程滄波（中央日報）為主任委員，黃天鵬（時事新報）為經理委員會主任委員、王芸生（大公報）為編輯委員會主任委員（後王辭職，繼任者為劉光炎。）各報館總經理、總編輯分別參加各委員會工作。五月六日就國民公報原有設備編印，出一中張。封面第一條廣告是：「中央日報、時事新報、大公報、掃蕩報、新蜀報、新民日報、西南日報、商務日報、國民公報發刊聯合版啟事」。茲因水電交通及印刷發生障礙並奉最高當局手諭，重慶各報自今日起一律停刊，暫由各報發行聯合版，每日出版一中張或一大張。

聯合出版時間內，（本報等訂戶均暫時停止送報，由本報等聯合發行零售。（）廣告暫由各報營業處代收。」

發行聯合版是樁大事，所以發刊之初，說明發刊旨趣，此乃重要文獻，值得一錄，大意如後：

「第一，最近敵機的狂炸重慶，是抗戰開始後敵人獸行最野蠻殘酷的一幕，我們同業的犧牲慘重，聯合版的發刊，在將來中國報業史上，永遠是慘痛悲壯的一頁。中國現在與未來的新聞記者，永遠不會忘記這個聯合版發刊時的慘痛環境。

第二、聯合版所表現的精神最顯著的是團結。重慶的報界現在本是集合京滬津漢的精華，今天集織在一起，聯合版，對於革新上將更有進步，對讀者更可盡我們的責任。第三、敵人對我們的各種殘酷手段，我們的回答是加緊我們的組織，粉碎敵人的陰謀詭計。重慶這幾天的環境太悲壯了，重慶的新聞界在各種悲壯的經歷中，展開我們奮鬥的陣容，聯合版就是這種精神的表現。

這一發刊詞天鵬先生譽之為「媲美美國的獨立宣言」。

後來新華日報也參加了，至此湊成十家。聯合版雖然在名義上由十個報館的人員分擔各項工作，實際上因在時事新報編輯印刷，無形中加重了該報的責任，而時事新報又由天鵬先生領導，故聯合版編經兩部，裏裏外外，天鵬先生實際肩負了各項責任。說他扮演主角，確為至當。

聯合版之所以在時事新報編印，重要原因為該紙，並囑協助解決困難。我只有僱了大批工人，以人力代替電力，趕出一部份來。還有一次警報來了，來不及入防空洞，我和一工友立在美豐銀行門前，不幸行前落彈爆炸，站在我前面的工友，竟為聯合版而壯烈成仁，我幸而大難不死。」

報的工廠、排字房及編輯部倅未被炸，而且位於重慶新街口，為重慶市交通最方便的中心地帶。天鵬先生回憶這段生活，有如下的描寫：「

委員會相當於編輯部，但却採用輪流制，實際各不相謀，一切責任便落到經理委員會來，辦公和印刷又全部借用時事新報社，工作人員除了廣告

課調用中央日報人員，發行課用新民報人員外，編輯部因為各報的編輯，都依照原來的編輯慣例、標題的欄數、字體的大小、發稿的次序、時間，都和時事新報不盡相同，發完就走，也不負

看大樣的責任。工人無法配合，第一夜我看情形不對，整夜照料他們。白天又要辦公，索性住在樓上留守，只要聯合版能夠出版，一切勞怨和冒險也無暇多計。我已變成『校長兼校工打鐘了』。」

「五月到八月是重慶最熱的季節，敵機不斷的疲勞轟炸，水電時停，夜半警報來了，躲入防空洞，等到解除，又在搖幌的燭光下編稿排印，工作人員的辛勞疲累和刻苦奮鬥的精神，實在值得一說。有一次整夜警報驚擾，報紙到上午編排出來，但却沒有電力無法印刷。近午，中央宣傳部長葉楚倫先生拿着最高當局的手諭，要當天的報紙，並囑協助解決困難。我只有僱了大批工人，以人力代替電力，趕出一部份來。還有一次警報來了，來不及入防空洞，我和一工友立在美豐銀行門前，不幸行前落彈爆炸，站在我前面的工友，竟為聯合版而壯烈成仁，我幸而大難不死。」

「聯合版最初是試驗性質。就當日抗戰環境的困難，洋紙輸入不易，新聞來源也感缺乏，實在沒有十多家報紙的必要。但試驗聯合版的結果

也不能統一，能夠維持出版已是不易了。我辦了短短三個月，在我十多年的新聞生涯，實在是最艱難最棘手的一段。在聯合委員會中會多次建議，各報疏建工作完成，應即恢復復刊工作。」

「聯合委員會在第十四次會議中，決定聯合版八月十二日結束，八月十三日起各報分別復刊。計自五月六日發刊至八月十二日結束共計九十九天，天天在敵機的彈雨中，冒險排難，繼續出版，不曾一日中斷，對敵人為不屈的抗議。這是長期抵抗的精神，是把握最後勝利的基本要素，在報業史上寫下最輝煌的一頁。」（以上引證見黃氏所著「陪都報業之回顧」）

天鵬先生把當年重慶各報成立聯合版的經過忠實地、毫不誇張地加以描繪，凡曾經服務於當時各報的人員，都能為他的記述作證。天鵬先生實在是聯合版的唯一舵手，其餘的人都是船夫。他又是光明製造人，其餘人都是湊亮的。想想看，若不是有聯合版，九十九天當中無報可讀，社會將成什麼樣子？（那時雖有中央廣播電台，但一般人却因買不起收音機，故聽戶寥寥。）人們心理上，能不蔽塞成一團黑嗎？

天鵬先生雖然說盡了苦頭、冒盡了危險，在他記者生涯中確是最艱辛的一段。如今回憶起來，但也是值得最驕傲、最光榮的一段。這也是「重慶精神」的具體事例之一。這樁事應為中國新聞史，最燦爛最特殊的一頁。筆者雖未能參加聯合版的工作，但却分享了老友的光榮。

黃氏於三十六年被選為國大代表後，除仍執教各大專學校教授新聞課程外，大部份時間則致力於民主憲政之實施。來台後，曾先後與張知本

「海外僑務，以達四海歸心，協助反共復國大業。」語重心長發人深省。

六、思想、人格與不朽事功

、鄭彥棻諸氏發起組織中國憲法學會，發行「憲法學報」、「憲政時代」等刊物，以鼓吹憲政之實施及弘揚民主之精義。由於黃氏多年從事新聞事業之經驗，以及盱衡世界民主國家的趨勢，其言論不但不落入窠臼作一般泛泛之論；抑且深入淺出，譬喻週詳，引人入勝，故影響深遠。在「中國憲法學會」中，他實擔負主要責任推動會務，避免一般學術團體之虛空，在「憲政時代」刊物內，他任撰寫主角，以為表率。他主張以五權憲法為民主憲政的建設中心。凡此都可以看出天鵬先生的治事精神。也就是說，一切榮譽歸諸他人，吃苦之事自己承受；輕而易舉的事教別人去做，沉重而艱辛的重擔，則由自己挑。這與當年負責「聯合版」的情形，毫無二致。其精神之堅毅與一貫，令人不由不生敬佩之感，實為當世罕見之人。在新聞人事中，尤不多覩。

「天廬論叢」包括「新聞論叢」「憲政論叢」「「僑務論叢」等著作，但仍是天鵬先生論著的一部分，非全部；他那些有關新聞的多種專著，並未包括在內。雖然，但這部論叢實綜合了黃氏近年寫作的大成，不但反映了他的思想，也反映了他的人格。所有同一時代的人，都可為他做堅強的證人。尤其年輕一代的青年人，如果仔細瀏覽這部書足以師法的地方太多。我很欣賞曹雪芹所說：「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一個人若選擇了新聞事業作畢生生涯，應洞明世事，也練達人情，何況天鵬先生又作了將近三十年的民意代表了。因此，他的人格、文章與事功，都可經世而永垂不朽，自不待言。

三十八年筆者自大陸來台初住金門街，那時相往來。後來他遷安東街，我搬永和，偶爾在公共場合相見，大都片言數語，不能深談。多年以來只有在文章中瞭解彼此的心情，互通款曲之便，並留心華僑狀況，所以對僑務有極高遠而精闢的見解。這些年來，每次自海外歸來，都仍界時，尚是青年，如今雖同是「人生開始之時」，然而畢竟不小了。我有機會為「天廬論叢」寫文章，發為文章，無不受當局之注意。他最友誼方面的缺失，衷心愉快，莫可言宣。

五、僑政的守護者

天鵬先生自青年時代即負笈東瀛，復因投身新聞事業，足跡遍及中國邊疆，並遠及蘇俄；近年來，更多次遨遊東南亞諸國，於考察一般情形，天鵬先生與黃盧小珠女士則住同安街，相距櫛比，時相往來。後來他遷安東街，我搬永和，偶爾在公共場合相見，大都片言數語，不能深談。多年以來只有在文章中瞭解彼此的心情，互通款曲之便，並留心華僑狀況，所以對僑務有極高遠而精闢的見解。這些年來，每次自海外歸來，都仍界時，尚是青年，如今雖同是「人生開始之時」，然而畢竟不小了。我有機會為「天廬論叢」寫文章，發為文章，無不受當局之注意。他最友誼方面的缺失，衷心愉快，莫可言宣。

四、憲政時代的鬥士